

## 女性与汽车：美国女性旅行叙事中的性别空间与流动性<sup>\*</sup>

刘英<sup>1</sup> 孙鲁瑶<sup>2</sup>

(1.2.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关键词 汽车 性别空间 流动性 旅行叙事

摘要 汽车实现了身体与技术的交融、自主与流动的一体,创造了流动的私人空间,为女性跨越传统性别空间划分提供了可能。汽车定义并塑造了美国文化,美国因而被称为“轮子上的国家”。因此,汽车进入了美国女性作家的视野,成为她们管窥现代技术、流动性与性别空间之间关系的重要窗口。20世纪的美国女性汽车旅行叙事经历了从为精英女性代言到为大众女性发声的立场转变,经历了从介入并改写传统旅行文学到公路文学的文体转变。这个演变过程一方面揭示了女性流动性受现代化进程、阶级、族裔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美国女性文学突破了汽车与女性解放之间的线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I712.07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6)02-0080-08

### Women and Automobiles: Gendered Spatiality and Mobility in American Women's Travel Narratives

LIU Ying<sup>1</sup> SUN Lu-yao<sup>2</sup>

(1.2.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Key words:** automobiles; gendered space; mobility; travel narratives

**Abstract:** As an intersection of body and technology and an integr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automobiles make it possible for women to transgress the traditional gendered spatial boundaries. As automobiles define and shape American culture and America is a "nation on the wheel", automobiles have also entered into American women writers' sigh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m to view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y, mobility and gendered space. American women's travel narratives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have changed from speaking for elite women to being a voice for the working class women, and from rewriting canonical travel literature to producing road narratives. This shift indicates that on the one hand, women's mobil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modernization, class and ethnic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has transcended the linear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mobiles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曾以格林童话《小红帽》为例揭示男权文化中性别空间规范的隐喻,“小红帽的任务是将一小罐

黄油和蜂蜜从妈妈家带到外祖母家,或者说从一个封闭空间转到另一个封闭空间,然而,她却违背家长叮咛,擅自穿越开阔的森林空间,结果被大灰狼吞

作者简介 :1.刘英(1968-),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女性研究、美国文学。2.孙鲁瑶(1990-),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5)的阶段性成果。

掉。小红帽的故事暗中昭示着男权社会对性别空间秩序的规定,贯穿着关于男性/女性、流动/静止等一系列空间划分隐喻”<sup>[1](PP41-55)</sup>。的确,正如西苏所言,《小红帽》警诫女性跨越性别空间秩序的致命危险,但另一方面,《小红帽》也透露出女性超越性别空间樊篱、体验“在路上”之空间流动性的潜在愉悦。如果说在格林生活的前工业时代,小红帽的身体流动性受到交通和空间的天然制约,那么,在汽车技术打破空间束缚的现代社会,曾禁锢女性的性别空间划分是否全面瓦解?曾让小红帽向往的空间流动性是否彻底实现?这是美国女性汽车旅行叙事长期热切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美国女性文学之所以关注汽车与女性流动性,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较之于轮船、火车和飞机等现代交通技术,汽车是最优先的流动性技术,汽车具有更强大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与身体流动性之间的联系更频繁也更密切。由于一战后欧洲和日本受创,美国以绝对优势填补了汽车制造的空白。汽车定义并塑造了美国文化,美国因此被称为“轮子上的国家”(nation on the wheel)。其次,汽车(automobil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由自动性(auto)和流动性(mobile)构成的复合词,体现出身体与技术的交融,在成为现代性之重要标志的同时,对于传统性别秩序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巩固男权文化,汽车既是雄性/技术的象征,又是女性/身体的化身;另一方面,模糊性别差异,汽车使自然身体转化为技术化身体,弱化自然身体的重要性。再次,作为一场空间革命,汽车创造了“流动的私人空间”,为颠覆传统性别空间划分、创造“第三空间”提供了可能。

上述三种因素共同促成汽车进入美国女性作家的视野,成为她们管窥现代技术、流动性与性别空间之间关系的重要窗口。从20世纪初汽车在美国迅速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汽车进入美国千家万户,女性驾驶汽车的议题频频出现在美国女性文学作品中。但已有的汽车旅行叙事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男性作家,尤其是以杰克·盖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为代表的男性公路文学。事实上,女性作家不仅同样积极参与了关于汽车与流动性的讨论,更是从女性独特视角见证、记录、回应和反思了现代技术

为女性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纵览美国女性文学中的汽车旅行叙事,可以发现,其发展脉络不仅阶段清晰,而且特点鲜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最初十年到30年代,美国第一次迎来汽车消费高潮,由于汽车价格不菲,购买者集中在精英女性和富裕阶层。以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la Neal Hurston)为代表的女作家对汽车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游记文学中展现了汽车为精英女性扩展事业空间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为其叙事创新所提供的精神资源。二是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女性作家的汽车旅行书写相对沉寂。究其原因,概与经济萧条、二战期间美国公路建设完全中断、军用汽车大量生产、民用汽车生产停滞有关,50年代后期虽然汽车和公路发展加速,但也造成城市郊区化进程加快,再伴以战后婴儿潮的后续影响,女性往往被囿于家庭空间。三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美国公路发展与汽车发展齐头并进,公路文学大量涌现。随着汽车成为日常消费品以及女性主义意识的日益普及,普通女性掌握了“方向盘”,在文学领域,女性作家也驾驭并修改了公路文学这一长期由男性掌控的文体。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的游记写作和第三阶段的公路文学,并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汽车对性别空间意识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汽车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女作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表征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美国女性文学如何反作用于性别空间话语建构?

### 一、汽车流动性的性别属性

要探讨汽车对于美国女性流动性的意义,首先要从汽车对于美国国民流动性的意义入手,因为美国女性汽车游记叙事和公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从来不独立于美国主导流动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在对后者的质疑、挑战、协商中谱写出独特的女性流动性篇章。

纵观美国历史,社会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不可分割,地理(身体)流动性既是社会流动性的表现,也是获得社会流动性的手段,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到美国人而言,流动性的概念与早期殖民开拓

者的思想和旅程有着密切联系,比如,移民、拓荒、侨居等,美国也因此被称为“移动的国家”<sup>[2](P4ii)</sup>。地理流动性与社会阶层流动性承担着丰富的象征价值,塑造了鲜明的美国国民身份和自由理想。移动的自由成为美国例外主义话语的重要因素<sup>[3](P3)</sup>。美国流动性和自由理想支撑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在与文学文本相互依赖、相互生产的过程中,巩固领土扩张,强化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美国梦。

进入20世纪,“汽车成为美国梦的载体,是美国拓荒经历的延展”<sup>[4](P137)</sup>。汽车所带来的速度快感为行将结束的美国帝国梦想填补了空白。汽车流动性及其所承诺的自由移动也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想象,大量的公路文学、音乐和电影演绎着美国的流动性神话,美国是最具空间自由、最具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国家。然而,这种流动性神话掩盖了美国霸权空间政治,它仅仅适用于兼具白人/男性共同属性的美国人,而女性及族裔人群却被排斥在流动性之外。

汽车流动性的性别属性,是男权文化中两种划分的产物,即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技术与身体的性别划分。长久以来,女性就与象征静止的符号相关联,她是忠诚守候的佩内洛普,永远等候闯荡世界的奥德赛,她是倦鸟归家的港湾,是稳定不动的大地之母。所以,如果说汽车开启了现代空间革命,延展了身体空间的活动范围,提升了身体移动的效率,其实仅对于男性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此,历史学家弗吉尼亚·沙尔夫(Virgina Scharff)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驾驶汽车被认为是男性气质和男性流动性的专属,女性使用汽车的权利一直存在争议。”<sup>[5](P166)</sup>例如,1904年《郊游杂志》(*Outing Magazine*)的一篇文章很具代表性:“女人的性情和注意力不集中阻碍女人成为好司机,而且更可能让她们成为马路杀手。”<sup>[6](PP154-159)</sup>其实,20世纪初期,男权文化抵制女性驾车的理由与当时抵制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论调如出一辙,都隐藏着对其专属领域被侵入的焦虑。正如达芬·斯佩(Daphne Spain)在《性别空间》中指出的,“因为空间划分是强权群体用来维护其相对弱权群体的优势的有效机制之一”<sup>[7](P15)</sup>,因此,当女性跨越了空间边界,她们的身体移动就被视为对男权和社会秩

序的威胁。

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却促使汽车工业鼓励女性驾驶汽车,努力开拓女性消费市场。为促进销量,福特公司的汽车广告强调Model T操作简单,为女性司机量身定做,“只需手指轻轻一动,即可安全上路”。不难看出,男权统治的汽车工业对女性驾驶汽车的态度是分裂的、矛盾的。但正是男权文化和资本主义对待女性驾驶汽车方面的分裂和矛盾才不仅使美国女性驾驶汽车和驾驶汽车旅行叙事成为可能,而且也促使女性作家借此对男权性别空间划分进行批判,对汽车之于女性流动性的意义进行探索。

二、驶向未知空间和审美空间 汽车与精英女性在汽车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女性文学对汽车流动性和性别空间呈现出不同的思考角度。在20世纪早期,驾驶汽车是现代新女性追求独立的工具和标志。亨利·福特在1913年建立汽车生产线,几年之后,汽车的价格才降到足以让中产阶级消费的水平。在此之前,汽车属于奢侈消费品。尽管消费仅限于中产阶级女性,但其购买汽车的行为已然对传统性别秩序构成挑战,因为购买汽车与购买衣服不同,虽同为消费行为,但后者强化传统女性气质,而前者可能打破性别秩序和性别空间分隔,意味着女性获得流动性技术的使用权和走向开放空间的自主权。例如,妇女投票权运动就有效地利用汽车游行和露天集会进行巡回宣传活动。在一战期间,女性更是作为志愿者将驾驶技术应用到保家卫国之中。对此,弗吉尼亚·沙尔夫有如下描述:“20世纪20年代前后,正是关于女性投票权、公共/私人空间的性别划分以及女性大学教育等议题讨论得空前高涨之时,在这种语境中,女性驾驶汽车现象必然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sup>[5](PP22-23)</sup>。

在这场关于女性与汽车的公共论坛中,不乏美国女作家的声音。这些精英女性身体力行地纷纷展示汽车为构建流动、自主、独立的女性身份所做的贡献,以及汽车为其学术考察和文学创作提供的前所未有的优势。率先书写女性驾车体验的女作家当数伊迪斯·华顿。华顿是美国20世纪初期重要小说家。她生于纽约的上层贵族家庭,是位名副其实的汽车

爱好者,其自传《回眸一瞥》(*A Backward Glance*)清楚地记载了她与汽车的不解之缘<sup>[8](P136)</sup>。1908年出版的游记《穿越法国》(*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是女性驾车游记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是女性通过汽车实现主体性和空间主导权的较早范例。借助于汽车,华顿进入法国未曾涉足的陌生地域,体验了全新的历史维度和空间身份。华顿认为汽车的流动优越性显然超越了火车:“汽车带回了旅行的浪漫,它使我们免除了火车的限制,不用和火车打交道,不必恪守固定时间固定线路,不需要穿越火车沿途的丑陋荒凉地带就能前往每一个小镇,它带回了曾让我们祖父母旅行之路熠熠生辉的奇迹、冒险和新奇。”<sup>[9](P1)</sup>进入未知领域的“冒险”和“猎奇”通常只为男性所占有,而汽车却让女性也能体会到“开疆拓土”的欢乐。

华顿的汽车旅行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求新觅异,更是一种审美追求。从法国北部穿越到南部的过程中,华顿拜访了历史气息浓郁的教堂,品鉴了具有法兰西文化特色的建筑,这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作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体验,不借助汽车,这种自由随意又连贯的空间移动是很难实现的。法国的文化朝圣使华顿汲取欧洲文化精髓,并将其运用到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安娜·帕雷洛·瓦迪罗(*Ana Parejo Vadillo*)在《女性的现代性体验》第三章“流动现象:现代性旅游的美学和政治”中曾指出:“汽车为女性提供了现代性的视觉学校。女性成为观察者,而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sup>[10](P214)</sup>如果说在传统游记中,女性与风景都是被观察的客体,男性才是观察和鉴赏艺术的主体,那么,华顿的《穿越法国》则是对这一传统的挑战,女性既是驾车的主体,也是观察的主体。

汽车不仅是华顿在美国和国外旅行的工具,而且驾车体验也构成其旅行叙事的重要内容,甚至使其叙述形式也带有汽车流动性的烙印。1908年的《文学文摘》这样评论《穿越法国》所体现的“汽车旅行叙事”风格:“华顿以旋风般速度带领读者穿过法国的城镇和风景如画的乡村,以非凡迷人的笔调描绘了汽车两边一闪而过的美景和名胜。”<sup>[11](PP911-912)</sup>玛丽·苏珊娜·施奈博(*Mary Suzanne Scriber*)等评论

家也注意到汽车技术所带来的视觉体验如何改变了华顿的旅行叙事:“汽车旅行使华顿能先以广角镜头看到城镇的全貌,然后再聚焦到某一具体景物。”<sup>[12](p211)</sup>可以说,这种镜头长短距离的自由调整正是华顿有效利用汽车流动性的体现,《穿越法国》在粗笔勾勒与细致端详之间的灵活穿梭,使它在当时欧美游记中脱颖而出。

如果说华顿开拓了女性作家书写汽车旅行的先例,那么,佐拉·赫斯顿则是紧随其后的承继者。作为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领军人物弗朗兹·伯瓦斯(*Franz Boas*)的学生,赫斯顿受过现代田野调查方法的严格学术训练,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人类学家、黑人民俗学家和小说家,代表作《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赫斯顿凭借独有的天赋和才华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中获得了一定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得到了社会名流夏洛特·奥古德·梅森(*Charlotte Osgood Mason*)的经济资助,多次去美国南部收集黑人民间传说,完成了《骡子与人》(*Mules and Men*)这本著名的民族志。自1927年起,赫斯顿驾驶纳什轿车频繁穿梭于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与纽约城之间,体验地方风俗,在途中偶遇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并随之结伴同行,开启了赫斯顿真正意义上的汽车之旅。两年后,赫斯顿新购了一辆雪佛兰(*Chevrolet*),这是写作《骡子与人》时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

《骡子与人》虽然是部民族志,但同时也是旅行叙事,该书用大量篇幅详细记录了民俗资料采集过程,尤其突出了汽车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骡子与人》的开篇就是汽车,“开着雪佛兰一脚油门,她迅即来到了伊顿村”<sup>[13](P5)</sup>。在之后的篇章中,汽车不仅没有遁入背景,而是反复出现在她收集资料的各个场景之间。汽车为身兼学者、作家、非裔等多重身份的赫斯顿从事学术和文化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扩大了她的学术范围,使她克服种族隔离的障碍,获得了空间移动的自由。可以说,没有汽车的帮助,赫斯顿的民俗学调研必定难以开展,如她所述:“我要去的地方常常交通不便,单凭双脚则令人望而却步。”<sup>[14](P96)</sup>而雪佛兰让她如虎添翼。赫斯顿驱车数

千英里,深入南方,广泛采集民歌民谣和各类民族文化遗产,是汽车使她能够探索开阔的公共场域,获得广泛的一手学术资料。

但采集材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初期的汽车在为精英女性扩大学术空间的同时,也让赫斯顿在美国南方遭遇到阶级矛盾的困扰。赫斯顿在《骡子与人》中对此有细致描写。当赫斯顿开车进入南方农村,村民围观她的汽车,对她抱怀疑排斥态度。于是,赫斯顿把“自己的车变成所有人的车”<sup>[13]</sup><sup>(P70)</sup>,邀请村民和采访对象与她一道乘车,终于成功被村民“内层”所接纳。村民争先给她做向导,为她提供线索和行车路线,让她得以深入体会民情民风,采集到翔实的民俗材料。可以说,借助汽车,赫斯顿成为使者搭建了现代性与南方乡村的桥梁,《骡子与人》就是对此的生动见证。

除华顿和赫斯顿外,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教母格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也在其《艾丽斯·托克拉斯自传》中坦言,汽车不仅是扩大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而且是激发实验写作灵感的来源:“汽车的移动和街上的喧哗让她的散文带有动态的节奏。”<sup>[15]</sup><sup>(P233)</sup>

总之,20世纪初期的女作家对汽车普遍持拥抱态度。与同时期的男性现代主义作家如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将汽车作为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象不同,女性更注重汽车所带来的空间流动性,将其作为打破性别空间划分的有力武器。最明显的对比是在一篇题为《加油站》(Filling Station)的札记中,赫斯顿描写了加油站的两位男性由于对车的品牌争论不休,最后大打出手,耽误了上路,而一位前来加油的女士则丝毫不受品牌概念困扰,对男人的争论不屑一顾,而是径直上路。赫斯顿通过这个描写揭示了男性对汽车品牌和符号消费的迷恋,而女性因为仅注重汽车的使用价值,即空间流动性,并从中得到更多收益。

虽然从文类上来看,赫斯顿和斯坦因的旅行叙事不符合传统旅行文学的标准,但都是对女性借助汽车进行空间流动实践的探索和思考,因此,根据米歇尔·德·塞图尔(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空间实践》,这些都可纳入旅行叙事,拓展了女性流动性的

研究视野。

三、公路上的“第三空间”:汽车与大众女性,解放抑或流浪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美国联邦政府投建了全面完善的公路交通网,公路四通八达,促进了公路电影、音乐和文学的蓬勃发展,就在其出现程式化趋势之时,恰逢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风起云涌,催生出《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这样脍炙人口的女性主义公路片,表达了工薪女性通过汽车流动性冲出家庭束缚、寻求自由空间的渴望。除公路电影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公路文学,颇具代表性的小说有:芭芭拉·金索芙(Barbara Kingsolver)的《豆树青青》(The Bean Trees, 1988)、希尔玛·沃利兹(Hilma Wolitzer)的《心》(Hearts, 1980)、切尔西·卡因(Chelsea Cain)的《达摩女孩:一场跨代的公路旅行》(Dharma Girl: A Road Trip across the American Generations, 1996)和迪安格·兰西(Diane Glancy)的《旅行中的声音》(The Voice That Was in Travel, 1999)等。

那么,公路文学为什么对女性作家具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赫金(Бахтин,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在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中就阐述了公路叙事的特性:“在公路上,来自于不同阶级、宗教、国家和年龄的人们在某一时空点交集”<sup>[16]</sup><sup>(P243)</sup>,使公路具有了叙事空间的对话性。尼尔·坎培尔(Neil Campbell)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公路提供了文化接触域”<sup>[17]</sup>,为不同阶级、族裔、性别的人们提供了互动的场所。正是公路的这种对话性、公共性和开放性让处在流动性边缘的女性看到了超越性别空间划分的希望,也让女性作家介入公路文学写作,从而打破文体的性别划分。

美国女性公路文学不仅明显区别于男性公路文学的视角和体验,也迥然不同于早期阶段的女性汽车旅行叙事。如果以《在路上》为代表的男性公路文学中,自己开车穿越美国或者搭车浪迹天涯的男主人公逃逸的是物欲消费社会对人性的泯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对人性的阉割,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而在女性公路文学中,驾车上路的女主人公逃逸的

却首先是男权社会的束缚,追求的是空间流动性。如果说在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作家站在精英女性立场曾充满自信地畅想汽车给女性事业发展带来的无限机遇,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汽车普遍日常化,女性作家站在普通女性视角,更为辩证地思考汽车之于女性流动性的实际意义。

《豆树青青》就是女性主义公路文学的典型代表。小说塑造了一位意欲逃离南方传统家庭束缚而驱车西进的公路女性形象。小说的主人公泰勒·格里尔(Taylor Greer)原名玛丽塔,高中毕业后,发誓不愿因循守旧,力争摆脱那种泯灭自我的家庭束缚,渴望独立、开放和活跃的生活。带着对美国西部新生活的期待,她驾车上路,改名为泰勒,取自于汽车加油的小镇泰勒村。本想沿着公路漫无目的地西行,自由穿梭于未知的空间,可她的计划却中途发生了改变:一位切诺基妇女(Cherokee 北美印第安人)将自己的小侄女留给了泰勒,泰勒不得不带上她开始一段“公路家庭之旅”,而后单身母亲卢安(Lou Anne)及其儿子加入了这个特殊的“家庭”。她们在朝夕相处中培养出心心相印、生命相连的感觉。小说结尾,她们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组成没有血缘关系的温暖家庭。

《豆树青青》对于传统公路文学的改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说探索了将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融合的可能。在小说中,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是流动的家庭空间,实现了公私空间的一体化。泰勒原本独身一人、自由穿梭在原本属于男性的公路空间,小侄女的出现改变了泰勒的独行模式,两人超越血缘的母女关系使汽车变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移动家庭。汽车就是一所移动“住房”,原本私密、固定和静止的家庭空间被嫁接到了开放、流动的公共空间,使“公共”与“私人”空间相互交织。除汽车外,小说中多次将汽车旅馆描写为“家庭过渡空间”,创造了在流动与静止、“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的中间地带,让曾是男性专属的公路文学散发出母性光辉。

其次,《豆树青青》中的泰勒利用汽车旅行实现重新命名和定位自我,但泰勒的自我追求不同于男性公路文学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她在汽车旅行中获得的是一种与群体共生的自我,一个相互

温暖、彼此扶持的女性联盟。金索芙的《豆树青青》中的豆树是一种在恶劣环境下具有持久耐力的豆类植物,象征女性顽强地与男权文化的周旋和协商。小说虽然多次提及了西南部的恶劣环境,但她们将之改变为充满友爱和母性关怀的社会空间。

如果说《豆树青青》的母女家庭是在公路旅程中组建而成,那么,希尔玛·沃利兹的小说《心》则一开始便将法律意义上的母女家庭搬上了公路,并在流动的汽车空间中升华了“家”的概念。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寡妇琳达(Linda)与继女罗宾(Robin)在公路旅行中建立深厚母女感情的故事。26岁的琳达是位舞蹈教师,婚后6个星期突然丧夫不仅带给她巨大打击,还留下一个未成年继女。不愿意守着空屋和骨灰,琳达决心开车去加利福尼亚州开启崭新生活:“前往加州,就可以摆脱这里的一切,包括令人伤心的房子、东北部阴冷的冬天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sup>[18](PP19-20)</sup>在这一点上,《心》继承了男性公路文学传统,因为金闪闪的西部加州曾是美国国民的伊甸园幻想,也是众多男性公路之旅的终极目的地。然而,不同于男性公路文学中的奔着西部一路狂飚,琳达的西行之旅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右脚踩在油门上,左脚放在脚踏板,她觉得自己在跳舞”<sup>[18](P324)</sup>汽车是她的舞鞋,公路是她的舞台,小说谱写的分明是一场女性主义公路之舞。

与《豆树青青》异曲同工的是,小说《心》重点刻画了公路探险旅程中汽车和汽车旅馆作为共享空间在女性情谊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传统观念中,母女的情感交流都在私密的家庭空间中进行,而小说则将母女由疏到密的转变过程搬上了开放的公路空间,但又一定程度上因汽车的相对密闭而保留了隐私性,因而构成了一种公私交叠的“第三空间”。起初,琳达和继女罗宾关系敌对,琳达打算只身前往加州,将罗宾寄养在亲戚家,罗宾反抗琳达的安排,迫使琳达带她一起上路。在漫长的公路旅行中,琳达与罗宾在汽车的封闭空间和汽车旅馆的过渡空间互相照应,感情日渐深厚。同时,由于汽车行驶在公路这个公共空间,琳达与罗宾又不得不与各式路人、搭车人、加油站等来自于不同阶级和种族的人们打交道,在共同抵御外界危险的过程中,彼此感情升

温。琳达在流动的家庭中母性萌动,在察觉到罗宾对生母的好奇后,便驾车带着她去寻找亲生母亲。但罗宾最后依然选择与琳达相依为命,因为她与罗宾之间早已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母女亲情。

上述两部小说都在驾车西进之路上建立了母女联盟,而《达摩女孩》则在驱车向东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成就了心灵救赎并促进了母女沟通。该小说不仅在标题上明显在向杰克·盖鲁亚克继《在路上》之后的另一部力作《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 1958)致敬,而且在主题上也是对《达摩流浪者》的呼应,主要表现在《达摩女孩》的汽车之旅也是寻求信仰的心灵之旅。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切尔西(Chelsea)和母亲在行车路上的动态共享空间中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该小说摆脱了美国西进神话的文化包袱,而是向东寻求灵魂指引。切尔西主动找寻“垮掉一代”的文化遗产,不是出于怀旧的冲动,而是为了了解母亲一代的信仰。与母亲在移动的封闭汽车空间中的旅行,并不是为回到弗洛伊德所说的“前俄狄浦斯时期”母女天然相联的状态,而是“开车驶向爱荷华。我们去朝圣”<sup>[19](P19)</sup>。最后,切尔西理解并接受了母亲所迷恋的佛教。

从这三部女性公路文学代表作中可以看出,美国女性作家改写了男性公路文学和美国西进神话。女性的汽车之旅不是逃离浮华尘嚣到自然荒野中寻求个体自我,而是摆脱男权空间束缚,在流动空间中建立女性联盟。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女性公路文学并未将此视为解决基层女性问题的万能良方:首先,汽车作为流动的私人空间,成为家庭空间的延展,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违背初衷带养女或继女上路,表明汽车可能继续维护女性的传统母性角色。其次,汽车虽然让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但将家庭搬上公路却实属无奈之举。身为女性,不安全感如影随形。例如,小说《心》中琳达遇到的搭车人就叫“狼”,琳达每日忧心忡忡,感觉公路上危机四伏,搭车的男性不乏“大灰狼”之流。另外,女性独自带着未成年少女四处漂泊,而漂泊实际意味着无根。她们虽然获得了闯荡未知空间的肆意自由,却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和前途未卜之中。与精英女性不同,这些“在路上”游牧的美国基层妇女时常身无分文,

不得不求助他人以维持生计。小说通过多次描写她们与男性搭车者的情感交流,以及在路上寻求男性帮助更换轮胎等细节,暗示着对男性关怀的渴望。

所以,这些女性公路小说一方面塑造了女性联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个女性乌托邦并不完美,这不仅是个男性缺席的另类空间,而且是漂泊不定的流浪空间,并不利于女性及其所抚养孩子的健康成长。虽然公路上的汽车有如母亲子宫一样将她们隔离于男权统治,虽然驾车疾驰的母女二人组似乎是在对男权性别空间霸权发出阵阵“美杜沙狂笑”,虽然这也许正是法国理论家西苏所倡导的女性主义“飞翔”姿态,但深究起来,却不免有些苍凉。旅程势必会有结束之时,公路上的女性乌托邦终究会面临现实的考验。正如《豆树青青》中泰勒最后还是要“寻求头上的一片屋顶”,找寻稳定的落脚之处<sup>[20](P246)</sup>。

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女性公路文学并没有将汽车对于女性流动性的作用理想化和浪漫化,而是不乏冷静和辩证的思考:一方面充分展现汽车为打破性别空间划分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清醒意识到汽车在解放女性方面所存在的局限。

#### 四、结语

如果说小红帽是最早关于女性跨越性别空间的叙事,那么,美国女性文学在汽车时代对其做出了有力的回应。随着汽车和公路的发展,美国女性文学的汽车旅行叙事经历了从为精英女性代言到为大众女性发声的立场转变,经历了从介入旅行文学到公路文学的文体转变。这个演变过程一方面揭示出女性流动性受现代化进程、阶级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另一方面也显示美国女性文学突破了汽车与女性解放之间的线性思维。美国女性作家试图在静止与流动、家庭与自由之间为女性寻求“中间地带”和“第三空间”,不仅与主导的性别空间划分进行谈判,也与传统男性主导的旅行叙事进行协商。如果说女性驾车上路是在米歇尔·塞图尔所说的“日常空间实践”<sup>[21](P17)</sup>层面挑战男权性别空间分割,那么,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改写男性汽车旅行和公路文学写作,就是在雅克·拉康所说的“象征界”层面介入现代性与性别空间话语建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争取着空间意义上的性别正义。

## [参考文献]

- [1]Cixous, Helene.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tr. Annette kuhn) [J]. *Signs*, 1981, 7(1).
- [2]Wesley, Marilyn C.. *Secret Journeys: The Trope of Women's Travel in American Literature*[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 [3]Hilton, Van Minnen. The Rocky Road to Greener Grass: Mobility in U.S. History[A]. *Nation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U.S. History*[M].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Sanford, Charles L.. Woman's Place in American Car Culture[A]. Lewis, David L. and Lawrence Goldstein (eds.). *The Automobile and American Culture*[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3.
- [5]Scharff, Virginia. *Taking the Wheel. Wome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otor Age*[M].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1991.
- [6]Why Women are, or are not, Good Chauffeuses[J].*Outing Magazine*, May 1904.
- [7]Daphne Spain. *Gendered Space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 [8]Wharton, Edith. *A Backward Glance: An Autobiography*[M]. Philadelphia: The Curtis Publishing Co., 1933.
- [9]Wharton, Edith. *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9.
- [10]Ardis, Ann L. &Lewis, Leslie W. ed.. *Women's Experience of Modernity,1875-1945*[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Literary Digest, December 12, 1908.
- [12]Schriber, Mary Suzanne. Introduction[A]. Edith Wharton. *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Hurstun, Zora Neale. *Mules and Me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35.
- [14]Kaplan, Carla, ed.. *Zora Neale Hurston: A Life in Letters*[M].New York: Doubleday,2002.
- [15]Stein, Gertrude.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3.
- [16]Bakhtin, Mikhail. 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A].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 [17]Campbell, Neil. Road Narratives and Western Identity[J].*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2001, 36(3).
- [18]Wolitzer, Hilma. *Hearts*[M].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Giroux,1980.
- [19]Cain, Chelsea. *Dharma Girl: A Road Trip across the American Generations*[M]. Seattle: Seal Press,1996.
- [20]Kingsolver, Barbara. *The Bean Trees*[M]. London: Abacus, 1988/2001.
- [21]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 Berkeley, CA.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责任编辑 含章